

为三线建设者立传

——读唐宁新著《归去来兮》

◆ 朱大建



唐宁

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

晚报同事唐宁赠我一本地厚厚的新著《归去来兮——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为似被历史遗忘的大三线建设者立传。此书上了新浪读书、光明日报、上海文艺出版社、探照灯等好书榜单。

记得在2015年的春节，我去电影院看王小帅反映三线建设的电影《闯入者》，意外碰到唐宁。她告诉我：她要写一本三线建设者的书，所以来看这个电影。她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在2006年晚报夜光杯副刊

上，曾刊登过唐宁去贵阳访问上海内迁的新天光学仪器厂职工的连载纪实作品，当时引起较大影响。没想到她竟然念念不忘此事，立志要为默默无闻的三线建设者立传。

又过了4年，在2019年的秋天，我收到了这本43万字图文并茂的《归去来兮》。唐宁为写《归去来兮》，做了99次涉及到275人的采访和核实，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作者事前的预料，对一名退休记者来说，将275人的“碎片化”叙事，最终

整合成一本有条理有逻辑有人物有情节的非虚构著作，是艰巨的工作，不由得让人感叹和敬佩作者的文字能力、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

这本书以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为应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将重要军工企业从沿海内迁到大山里的历史作为背景，写上海光学仪器厂负责部分迁建和大力援建，上光厂大批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家属，牵着抱着孩子，扛着简单的行李，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荒凉的山沟沟里，克服工作上生活上的无数困难，很快建设起一个技术先进的新天光学仪器制造厂，为海军潜艇建造潜望镜，为国家生产各种光学仪器。而几千名内迁员工，加上家属有上万人居住的新添寨，讲上海话，吃上海小菜，流行上海服饰，成了上海嵌入贵州的一块民俗文化飞地。然而，当初的浪漫激情过去之后，接下来的便是日常的柴米油盐的艰难，便是上海大城市和贵州大山里生活、经济收入差距的体验。

这本非虚构巨著，写了100多

个真实姓名的人物，人物微观故事由当事人向作者口述，大量的真实人物出现在书中，生活细节有水汁淋漓的质感。这本书写了迁一代，迁二代，迁三代整整三代人，从上世纪60年代的计划经济社会，一直写到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写了十年动乱和后来的经济体制转型给新天厂带来的震荡，给人物命运带来的变化，增添了本书的深度、广度和厚重感。读这本书，可以从一个内迁工厂的命运变化，看出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和飞速发展。

《归去来兮》除写了100多个人物群像之外，也浓墨重彩写了几个贯穿始终的重点人物。如葛民治、王小帅、吕克勤、许东峰等人物和家庭。

葛民治是这个内迁人群的灵魂人物，原是新天厂的党委书记，内迁后是新光厂的党委书记，他原是进步学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九死一生。转业后带队赴贵州办厂，“献了青春献

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临终时几无存款。这是一个始终用理想主义光芒照亮内心的人物。

这本书的写作特色，主要是当事人口述，口述之外的宏观叙述及文字串联部分，由作者以第三人称作简练概括，这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结合起来的写作方式，尽可能最大程度保证人物和事件的真实可信，原汁原味还原当时情景，同时又兼顾了完整性可读性，称之为“史”，是确切的。如果再褒扬一点，称之为“史诗”，也不是不可以。而本书开头的“引子”，浓郁的抒情，诗意的文字，凝聚着作者很深的感情。千万知青下乡，曾引发很多知青文学作品，出现一个知青作家群，而涉及几百万人内迁的三线建设，文学作品很少，这正是唐宁新著《归去来兮》价值所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当前，广大文艺工作者隔离病毒，但绝不隔离大爱。隔离疫情，但绝不隔离艺情。隔离疫情，绝不隔离创作热情。虽然取消了新春演出的公共文化活

动，但上海文艺工作者依然以演唱、画作、祝福的网络视频和募捐等各种形式，为身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赞颂，为白衣天使加油，同时也宣传防护疫情的知识。

首先觉悟到文艺能鼓舞人心的就是漫画家——1月24日，2020“众志成城战疫情”漫画展征稿启动，4天内就收到120位漫画家发来的近400幅作品……上海评弹团青年编创杜竹敏大年夜完成了她的评弹开篇《众志成城迎春归》，在团长高博文带领下，集结另外六位中青年评弹演员，在年初三赶到剧场集体录制成了节目。上海戏剧学院王苏、刘婉玲等四位老师合作，在各自的城市，通过网络、隔空录制了由方军创作的配乐长诗《2020，这一个春节》，向四面八方的听众传递了关爱的声音。上海越剧院钱惠丽等著名演员特别策划了一首宣传防护知识的流派联唱。上海京剧院史依弘、唐元才等名家，通过短视频，以清唱等方式向疫情一线“战士”致敬。上海淮剧团的梁伟平、邢娜等推出了配乐诗朗诵《在这个春天》。上海沪剧团在茅善玉院长的带领下，正在创排两台小戏……

民营剧团也不甘落后。他们主动请缨、自觉上阵。上海新东苑集团和新东苑沪剧团带头捐款200万元。在大年初一，田耘社赵松涛自编自唱《数来宝·福佑中华》：“有多少人他们的脚步不迟疑，抗击疫情赴一线，整装出发奔武汉，逆行的身影意志坚，抗击疫情敢为先”。我们要为这些在抗击疫情战斗中

我们必须拿起武器

◆ 戴平

主动担当的文艺界人士点赞。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和广大医务人员、新闻工作者一起，拿起笔，作刀枪；上视频，唱战歌。写的是心，唱的是情，响起的是祝福。他们用新鲜出炉的作品鼓舞士气，用动人激越的声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共克时艰，众志成城。

我们也要拿起武器。我们应该拿起武器。抗击疫情的武器有各种各样。抗击疫情需要医疗专家，需要医生护士，需要物质装备，但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文艺作品也是武器。一支歌，一首诗，一张画，一段唱，都是抗击疫情的有力武器；视屏、电台和互联网都是抗击疫情的第二战场。艺术可以使人们的内心爆发出火花、心灵得到净化和抚慰，增强战胜瘟神的信心，消除焦虑和不安。文艺工作者也是不可缺少的心理医生。他们送出的热情的歌声、戏曲唱段和朗诵、画作，可以激起人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信心。

这些作品歌颂了当今时代最可爱的人、最美的人。歌颂当代医务工作者，就是歌颂当今时代的崇高之美。在不少作品中，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还向大家传递了关爱的声音：要多一份小心，但不必惊慌；在家里待着，同样是对社会作贡献；在家里待着，既是自我保护，也是保护别人；你的平安，就是为大家的健康作贡献。有些作品，宣传普及防疫的科学知识，也是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斗争的重要方式。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最好的源泉。艺术家心有所感，才能讲好感人的中国故事，塑造出感人的英雄人物，以出色的作品来回答人们的期许。

还被恶搞的郭沫若一个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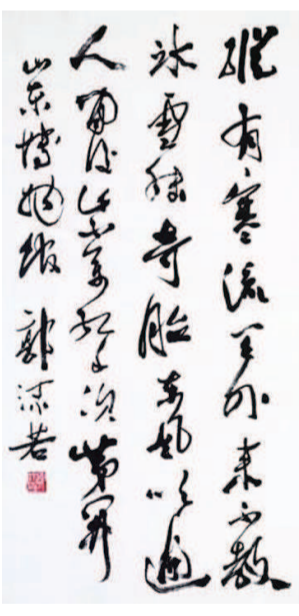
——致山东博物馆

◆ 陈履生

2020年1月22日，网上刊登了“山东博物馆匾额或因郭沫若字体潦草更换提案已立案”一文。标题上的“潦草”二字，看着有点不顺眼。虽然“潦草”可以作字迹不工整的解释，但是，通常人们都把草率和不认真的认为是“潦草”，具有贬义。这里无意评价郭沫若先生书法的好坏，可是，说其“潦草”却有失公允。

1959年2月，郭沫若先生到山东省博物馆参观，即兴书写了一首诗：“纵有寒流天外来，不教冰雪结奇胎。东风吹遍人间后，紫万红千次第开。”从这首诗和这幅行草书体来看，应该是相当认真的，不能说“潦草”；如果说其“潦草”，那么，等于说中国的草书都是“潦草”，相信中国书法家们是不会认同的。

回到问题的原点上。1992年10月山东博物馆干佛山北麓的博物馆主体建筑落成，当时的主事者以郭沫若先生1959年给山东博物馆题诗落款中的字，集成了馆名牌匾，并一直沿用至今。尊重先贤是中国传统之一，历代牌匾一般都是请名人题写。中国博物馆界由郭沫若题写（或集字）馆名的较多，1925年的10月10日挂牌的“故宫博物院”出自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手书，如今所见则是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时，根据周总理的批示启用了郭沫若题写的匾额；另有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乾陵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柳州博物馆、桂林博物馆、郑州博物馆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郭沫若先生1952年就任中央考古训



练班主任，又是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与文物、考古、博物馆界的关系深厚，1992年山东博物馆的主事者集其为馆所题诗中的字为馆的牌匾，于情于理都不为过。

问题的核心是郭沫若的集字被恶搞了，有人把草书“博”看成了“情”，把“物”看成了“妇”。中国的文字既有形似的，也有音同的，更有同一个字有不同的写法和不同的念法，无疑，这为恶搞提供了可钻的缝隙。殊不知，现在有职业的手段，有恶搞的专门家，就是利用这方面的特点下手，以此博眼球，蹭热点。娱乐和消费有很多方式，调侃和恶搞则是其中之一二。“山东博物馆”因为字体的原因，不易为对草书不了解的人们辨认，被一些人发现了机会。被恶搞的也不是山东博物馆一家，或

具体到某一块牌匾。现在还有人把“荣宝斋”识为“荣宝齐”的还大有人在，而当年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建成之后，没有太多文化的人常常说成是“关山月武术馆”，同样不乏恶搞。“博物”二字的草书规范，与恶搞的字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应该“我自岿然不动”。否则，屈就了恶搞，恶搞之风就会愈演愈烈。邪不压正，恶搞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人失去了定力。

就牌匾的书写来说，自古就有真草隶篆的各种字体，表现了中国牌匾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书写的字体来说，除了正楷之外，草书和篆书对于一般人都不好辨识，但不影响它的存在。对于“辨识”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牌匾字体的易于辨识是其基本，具有特色也是一种追求；当然，能够两者结合为最佳。吴昌硕所写的牌匾，基本上都是具有他个性特点的篆书，对此很多人并不认识。如此经历各朝各代，东西南北中而相安无事。牌匾是中国独特的一种艺术载体，延续和发展到今天，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后人更应该珍惜和珍爱。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关联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伤害了传统的牌匾艺术和书法艺术。再回到提案中来说，显然，有很多是历史问题，是历史造成，是前人的作为。我们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尊重传承，兼及艺术，把“山东博物馆”改成集王羲之字，显然不是一个妥当的方案。作为立足于深厚文化大地上的山东博物馆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去面对恶搞，也应该有充分的专业自信去面对社会的各种舆论。